

马寅初人口思想再认识

王 涤

摘要 马寅初人口思想体系的鲜明特征是实践性、人民性、协调性和前瞻性。实践性是马寅初人口思想的基本特征,这给他的思想带来无可非议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人民性是马寅初人口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马寅初人口思想与马尔萨斯人口论最本质的不同点。协调性是其学说的理论依据和衡量标准,是我国当代人口学界中最早出现的可持续发展观。前瞻性是其人口思想最具有先进性、最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精萃聚焦点,是其思想的最高境界。

作者 王涤,女,1955年出生,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杭州师范学院人口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人口学会会员,浙江省人口学会副秘书长。(杭州市 310028)

马寅初先生对中国人口发展和人口理论的建立有着独特而卓越的贡献。在其《新人口论》发表4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现在的人口理论研究已日趋成熟,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一个独立的体系;控制人口工作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在今日中国突飞猛进的人口理论研究领域和控制人口实践中,马寅初先生的人口思想可以说仍然没有过时。这是一个服膺人心的历史事实,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理论现象。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这一中国人口思想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科学财富,我们要把握好马寅初人口思想的精髓。不仅要历史地研究其人口思想的基本特征及其基本观点,更要通过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再研究再认识,在今日人口理论的研究与控制人口的实践中,尤其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口理论、研究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等方面发挥其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马寅初先生主要是一位经济学家、教育家,但从他为数不多的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章中,尤其是从他的《新人口论》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看,我们完全可以

说他是当代中国当之无愧的人口学理论鼻祖。虽然,早在1953年、1954年,邓小平同志、邓颖超同志及民主人士邵力子先生都已经先后提出过有关节制生育的思想与观点。1954年刘少奇同志也在当时召开的节制生育座谈会上明确地表态:“党是赞成节育的。”^[1]1956年,在党的“八大”会议上,节制生育的主张第一次写入党中央的报告,公布于世。但是,在中国人口思想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人口与粮食、资金积累、劳动生产率、人民生活水平、科技发展等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是1957年马寅初先生发表的《新人口论》。在他的《新人口论》及其他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其50年代的人口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已初步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具有自己的特征。

根据系统探讨和研究,笔者认为,马寅初先生人口思想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寅初人口思想的实践性。马寅初先生治学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的人口思想的基础根植于客观实践。其《新人口论》就是他在1954年、1955年

先后三次视察浙江,经过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研究后而撰写成的。当年,他跑遍了旧时浙江 11 个府中的 10 个府,并“每到一个村必定向社里的负责干部和老农了解近年来村里出生的人口有多少,死亡的有多少,生死相抵以后,净增加有多少。”^[2]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积累了大量的实地材料,并通过对比人口过快增长同国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系列矛盾的研究,写下了《新人口论》。《新人口论》有统计数据引证、有实际案例分析、有详尽算帐对比等,论据极为客观可信,观点全部来自客观实际,这是一种从客观实际中来、经过从感性到理性认识上的飞跃,最后反过来指导实践的理论思想。这一思想具有坚定的实践性特征,并给马寅初先生人口思想带来无可非议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又正是因为拥有这一真实性与科学性,马寅初先生对自己理论的正确性充满了坚定信心。他坚信自己这一来自客观实际的观点是正确的,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经得住批判的,也经得住实践检验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极“左”思潮的影响,这一理论观点直至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才予以澄清。然而,马寅初先生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坚实的理论基础,已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了这一点,坚持了这一点。他在《联系中国实际来再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一文写道:“我不同意朱熹的说法——‘理在事外’,却同意王船山的说法——‘理在事中’。”^[3]所谓的“理在事中”就是指事物具有自身的客观性、规律性,理论、道理(理)来自于客观实际(事),也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事)才能知道、才能证明什么是真正的真理(理)。马寅初先生认为他的《新人口论》是从实践(事)中来,是符合客观规律(理)的,因此也只有实践(事)才是检验他的理论(理)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他说:“对于学术问题的错误,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要分辨两种性质的错误,有一种人并没有花过收集材料、认真研究的功夫,只是从感想出发,随便说出些错误的意见。这种错误应该说并不是在科学研究中的错误,而是根本不进行科学研究的错误,这种错误除了证明人们不应当这样做以外,没有任何意义。另一种人是认真做了研究工作,但是因为方法不对头掌握材料不完备或其他原因而作出了不正确的、不全面的结论。这种错误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往往是在达到真理的过程中所难免要经过的过程。”^[4]正是基于这

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深刻认识,所以他“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5]他认为:“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特殊的人口问题,要调查、分析和研究,要用大量的有关资料来立自己的,不能专凭教条来破别人的。毛泽东主席说过:‘真正的理论,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的理论’。”^[6]“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7]

事实证明,也正是马寅初先生对待科学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他的人口思想所具有的实践性基本特征,才使其人口思想理论在经历了巨大的挫折和磨难后,至今仍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经受了历史的考验、时间的裁判。

二、马寅初人口思想的人民性。作为一名从旧社会过来、出过国留过洋的高级知识分子,作为一名一直在上层建筑领域从事学说研究的著名教授学者,马寅初先生人口思想中人民性的表现尤其难能可贵。鲜明的人民性是其人口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这一人民性不仅仅表现为他的学说观点产生于深入人民群众的调查研究之后,其理论思想源于人民、源于实践;还表现在他的人口思想浸溢着他对国家对人民的深切的爱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上。他为什么要关注人口问题,就是因为他在南方调查中发现:“令人瞩目的是这些地方儿童特别多”,^[8]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以一个经济学家的敏锐洞察力,感觉到人口的增殖率过快过高的沉重负担,他担忧“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9]担忧“消费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会妨碍人民生活的改善;积累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会降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10]而“这两种情况都是对人民不利的。”^[11]他之所以要提出控制人口的主张,就是因为“控制人口,为的是要提高全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借以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使他们能过更快乐更美丽的生活。”^[12]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论》中的这一段话其实就是一段感人至深的真挚的“爱民歌”,从中我们仿佛可以感触到他那颗滚热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之心的剧烈跳动。至此,他研究中国人口问题,历经两年仍坚持发表《新人口论》的动机与目的,已明明白白地诉示于世人。

马寅初先生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评,从另一角度充分显现了其人口思想的鲜明人民性。他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呈现一种冷酷忧郁的色彩”。^[13]

“马尔萨斯就这样把贫苦的责任放在贫民自己的身上,把富人的责任推得净光。富人闻此可以高枕无忧矣。虽然他建议采用预防人口增加的方法,他的人口学说给劳动群众一个没有希望的悲惨远景”。^[14]而马寅初先生认为“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15]“马尔萨斯从掩盖资产阶级政府的错误措施出发,我则从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出发”。^[16]很显然,他之所以提出要控制人口的观点,是因为人口的过快增长同国家加速资金积累之间产生了矛盾,同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产生了矛盾,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产生了矛盾,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产生了矛盾,归根到底是同国家要发展、人民要提高生活水平产生了矛盾。他明白地指出:“我讲的是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能不能保证全国人民早些走进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这个大门迟早要走进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早些呢,还是晚些呢?你们要人多,要人口增加至九亿、十亿,岂不拖住我们进共产主义社会大门的后腿吗?”^[17]马寅初人口思想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一个最本质的不同点就是他的人民性。

正因为他提出控制人口的思想主张完完全全地为国为民,无一丝一毫名利之求、哗众取宠之意,鲜明的人民性犹如旗帜般地高高飘扬,所以马寅初先生在坚持他的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思想主张时才能够做到无私无畏、光明磊落。马寅初先生在他的《附带声明》中引用了1959年4月9日《人民日报》的一段话:“我们共产党人要赤胆忠心地为人民工作,不要为虚名工作;要按实际情况办事,不要按‘空气’办事。”这就是他人口思想人民性的真实写照。

三、马寅初人口思想的协调性。作为一名卓有成就的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对政治经济学中两个最主要的原理——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协调发展有着深刻理解和牢牢把握。在马寅初先生的人口思想中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征就是他的协调性。他正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发展的协调中发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正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发展的协调中去寻求解决人口问题出路的。突出的协调性是其学说的理论依据和衡量标准。他说:“辩证唯物论所说的宇宙中的事物都有内在的联系,我们不能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察去看世界,因此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各个部门,各个地区,是一个有机地结合着的整体。”^[19]在这样一个有机的整体中,马

寅初先生认为人口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与粮食消费、资金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人民生活、科学技术进步等方面存在着极为密切的比例关系;要发展整个社会、整个经济,就决不能忽视人口的发展、决不能忽视人口与经济的各种综合平衡、各种比例协调。

《新人口论》中列举了大量的数据和事例,指出人口增殖过快是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建设与发展的,因为“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20]从而形成了矛盾;人口增加得太快而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受阻从而形成了矛盾;人口增加得太快,不能满足人们在粮食、消费、就业等方面的日益增长的需要,无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而形成了矛盾;人口增加得太快而科学研究却“受现有工业水平和国家财力的限制”,“不能完全满足开展研究的要求”,“拖住科学研究前进的后腿”^[21]从而形成了矛盾等等。要解决这些矛盾,要实现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最终只有一条出路、一个落脚点,就是要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使人口数量的增长与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相协调。

可持续发展是近年国际社会出现的一种新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战略。而协调正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最大特征。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马寅初先生当时还不可能把认识提高到当今世界可持续发展理论这种把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放到人类与自然界永远协调相处的高度来认识问题,他的理论思想主要还局限在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认识中,尚未论及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 and 生态平衡等问题。但他已经抓住了可持续发展的中心(或核心)——人,并把人的发展置于与社会、经济的整个协调发展之中,用协调发展去认识人,用协调发展去认识社会,用协调发展去谋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以最终达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共同协调发展。这种协调发展观,应该说已经初步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本特征,所以也可以说马寅初先生的人口思想中的这一协调性,是我国当代人口学界最早出现的可持续发展观,是中国人口理论中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最早萌芽。

四、马寅初人口思想的前瞻性。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发表至今,已经过去40年有余。当年的新生事物,曾为人们所不理解、不接受,甚至遭受非议和批判,但符合客观规律的新生事物毕竟是代表着进步、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具有顽强的生命

力。在4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马寅初先生50年代有关人口思想的论述,可以看到,在他的人口学说中,他当年预见的许多人口问题在历史演进中已不断被证实被显现,还有许多问题至今仍存在,还尚待引起重视给予解决。我们回头看他的这些理论,可以发现,不仅他的控制人口增长的理论至今仍然是我国人口战线工作的主旋律之一,而他在40年前就提出并倡导的关于提高中国人口质量的主张,更是当前我国人口战线最具时代特色的新鼓声。今天,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人口质量问题应该成为今天人口科学的时代性重大课题。因此,直至今日,细读马寅初先生有关人口的文章,仍然可以使人常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并受到深刻的启迪。面对这一切,使得我们对马寅初人口思想的前瞻性与科学预见性不由不怀有深深的敬意,不由不发自内心的信服。马寅初人口思想这一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前瞻性和科学预见性,是他的人口思想中最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精萃聚焦点。

今天,人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和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口现状也发生了不少的变化,有了新的发展。但这一个认识的变化与发展过程,实际上正是一个不断证实马寅初先生的人口思想、以及他对人口发展趋势分析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实现马寅初先生关于控制人口主张的过程。建国近50年来中国人口不寻常发展的历程,给我们留下了一段对马寅初先生所预言的人口问题的极为痛苦的真切体验。回顾我国控制人口实践过程,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几起几落的十分曲折复杂的过程,但最终我们还是找到了并坚定地选择了实行计划生育这一适合中国国情的光明之路,直至把它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人口发展当代史不仅全面地实现了马寅初先生控制人口的最初的观点和主张,甚至在计划生育的具体实践中,其中采取的不少有效控制措施和手段,都与当初马寅初先生早年提出过实行计划生育的有关措施主张极为相近相似。科学的预言与历史的真实在这里得到了众多的拍合。应该说马寅初先生的人口思想是一领中国人口发展数十年风骚,至今风华依旧。

50年代的中国,人口数量问题尚未成为重大社会问题,即使出现也刚处于萌芽状态,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而人口素质问题更是无人敢于直面。或许是历史的局限性,或许是受到极“左”心态的束缚,50年代的中国,人口整体素质的问题是被完全忽

略的,还无人敢说或无人敢于面对或无人敢于这样地认识中国人口素质低的严峻社会现实。马寅初先生却不然,他不唯教条,敢于冲破思想桎梏,不仅大胆、客观、超常地提出要控制人口数量,而且还提出要提高人口素质。这在当年需要有何等的勇气、何等的胆量、何等的智慧、何等的学识以及对世界、对未来何等的科学把握。

为什么马寅初先生的人口思想能够具有如此的前瞻性。马克思主义人口再生产理论告诉我们,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特点。物质资料再生产的成果表现为物质产品,人口再生产的成果则表现为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具有一定质和量的人口变化。人口再生产具有惯性作用,在一个不断增长的人口总体中,这一人口再生产的惯性作用不依社会生产的方式为转移,在相当时期内人口再生产的高低峰会周期重复出现。人口数量问题的始生与发现会有一个较长的从隐性到显性的逐步发展过程。而马寅初先生在其问题的始生阶段或称作隐性阶段就已经把握了问题的实质所在,抓住了事物的发展方向,故而等到问题自身发展到发现阶段或称作显性阶段时,就显现出其对问题认识的前瞻性把握。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马寅初先生人口思想所具有的前瞻性,根本原因是因为其理论思想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人口再生产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一前瞻性成功的历史验证实质上是一种科学预见的胜利。

今日,我们再认识马寅初人口思想,可以愈加清楚地看到,他对中国人口质量问题的认识之深和为提高人口质量的呼声之强烈。时至今日,这一思想跨越了时间与空间后依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尽管现实世界中经济 and 人口的发展关系表现为许多不尽相同的众多结合形式,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总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社会对人口的要求也必然要从主要依靠人的外延要素——劳动人口的数量和劳动时间的增加,走向主要依靠人的内涵要素——劳动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因此,在社会、经济水平越来越高的发展条件下,人口再生产的变动就有着越来越明显的从数量要求转向质量要求的客观发展趋向,这是社会、经济与人口结合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所决定的。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马寅初先生关于人口质量观点的前瞻性,实质上是人类的认识顺应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科学产物,是他在人口科学发展上对真理的一种逼近和把握。(下转第42页)

平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在其他投入要素不变的条件下,企业雇用的劳动越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下降,只有把工资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企业才愿意多雇工人。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通过市场的竞争机制控制工资增长幅度,一方面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可增加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能力。

其四,改变劳动者的就业观念,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型、高风险的运行机制,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不仅财货资本的投资者要承担投资风险,而且人力资本的投资者也要承担劳动力技能积累不足和投向失败风险的责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首先作为劳动要素,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技能,通过就业竞争,才能获取并巩固自己在企业的主人地位。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由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僵化状态变为能动状态,随着市场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劳动者也就在就业-失业-再就业过程中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并在动态中实现效益型就业目标。而社会要为这种新的就业模式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和积极的舆

论支持。

参考文献:

- 1 弗里德曼. 劳动经济学(中译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
- 2—5 中国统计年鉴.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6
- 6 胡鞍纲. 中国就业状况分析. 管理世界, 1997(3)
-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7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胡鞍纲. 中国就业状况分析. 管理世界, 1997(3)
- 8—9 同 2
- 10 同 6
- 11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5
- 12 同 2
- 13 杨宜勇. 失业冲击波. 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6
- 中国统计年鉴.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5
- 14—15 李京文. 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经济.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5
- 16—17 中国统计年鉴.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6

(上接第 37 页)

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发表已经 40 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们通过对他人口思想的再认识,可以看到,这一思想所具有的实践性、人民性、协调性和前瞻性的思想特征,使其至今仍具有一种超越时代的理论价值与指导意义。通过再认识,我们还可以学到他严谨的治学态度,更可以从他的博大胸怀和对祖国对人民海洋般的深情中学到他坚毅的治学精神。它将指导我们大胆探索,积极创新,彻底改变和摆脱传统观念,尤其是传统的人口观、自然观的束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无私奉献,共创中国人口发展、中国人口学理论发展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 1 刘少奇. 当代中国的计划生育事业.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2.8

- 2 马寅初. 新人口论.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79.4
- 3 马寅初. 联系中国实际来再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 见: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下册).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169
- 4—6 马寅初. 重申我的请求. 见:新人口论.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79.60, 57, 63
- 7 马寅初. 附带声明. 见:新人口论.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79.56
- 8—18 马寅初. 新人口论.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79.4、3、4、4、20、41、6、47、55
- 19 马寅初. 联系中国实际来再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 见: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下册).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169
- 20—21 马寅初. 新人口论.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79.3、17